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车冬梅

(西安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关键词: 清代;“汉宋之争”;政治因素;学术态势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2)04-0112-05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中特有的课题。“汉学”指的是乾嘉考据学,“宋学”指的是理学,两者皆属儒学,皆为研经之学。缘何会出现“汉宋之争”呢?深入研究这一学术现象如何开始以及争执的状态、发展方向等问题可以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的双重影响对其产生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政治因素

决定“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在于清朝统治者对两者的态度。清朝虽然将理学与汉学并立为官学,但是由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及其政治需要的变化,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为了争取更好的发展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不得不分庭抗争,从而有了不同的兴衰命运。

清代康熙时期,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始受到重视。当时康熙皇帝的老师即笃信朱熹学说的理学家熊赐履,他将

朱熹注《论语·学而篇》作为对康熙皇帝进行日课的第一篇,既而逐渐将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说、天命气质之性、为己及人之道等学说一一向康熙宣讲,使康熙从中既学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方略,又学到了选才辅助政治的用人之道。因此康熙认为,理学乃立身根本之学,且极为尊崇朱熹,说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之功,后人无人能及。继而,康熙开始表彰朱学,编纂大量的图书,如《日讲四书解义》、《易经解义》、《书经解义》、《孝经衍义》、《性理精义》及《朱子全书》等,并制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同时颁布了以“文教是先”治国纲领: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论;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康熙《圣谕十六条》)。同时,还开设了“博学鸿儒”特科,以吸引汉族文人入仕为官,从而开启了康熙时代崇理学、学理学的风潮,也涌现了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方苞等一批理学名臣。

收稿日期:2012-10-22

作者简介:车冬梅(1975-),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与利益,清代统治者设禁书,并大行文字狱,至雍正、乾隆年间更是文网密布、冤狱丛集。“若明末遗老之著述,有关于前朝遗事之记载,或微吟深讽,以寄其蛮夷猾华之痛者,悉搜剔之不遗余力,如钱谦益之《初学集》、《有学集》、屈大均之《翁山诗文集》、金堡之《偏行堂集》、谢济世之《梅庄杂著》、陈建之《喜逢春传奇》等,皆于是毁板禁行。而禁书之令所罗得者,乃不下万余种,检摘字句,稍有不当,即指罪而刑诛之,一时文网密布,告讦纷起。”^[1]而一些官吏为邀功有时也会有过当的行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1],如此一来,学者个个自危。汉学家只能埋头于金石训诂之中,单纯地为考证而考证,为学术而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问题,但是这正符合统治者的目的。因此,考据学逐渐成为官方学术,许多汉学家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如纪昀就负责主持四库馆以及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时纪昀排斥理学的思想非常明显,致使同在四库馆的桐城派学者姚鼐因其理学倾向而遭到抵制。

但是清代道咸同时期,汉学却渐入穷途,这大致是因为许多汉学家只重视训诂,既不探求经文之义理,又不关心时事政治,只以是否使制度名物考证完备为学术优劣之判断,而“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2]。因此,一些理学家强调“明经期于致用,若以章句训诂为经学,不惟难成,成亦无用。穷经贵得其要,得其要则一经会归于一,诸经统会归于一,如是不惟文艺有条不紊,日用事物之间亦取之左右逢原矣,所谓得其要也。盖经书一切义理皆吾心所本有也,凡不合经书之义理者,皆吾心所本无也。我能就经书语言一一反之吾心,而实尽之,去吾所本无,全吾所本有。则六经四子浑然我之一心矣,岂非得要哉!”^[3]由此可见,部分理学家认为训诂考据是无法明经的,但是理学的研经方法却能得到经书所蕴涵之义理,更因为经书中所蕴涵的义理是人心所固有的,因此通过理学可将两者合为一体,并且去人所本无、全人所本有,自然可以立圣学王道之本,“学问于是乎成,政治于是乎出”^[3]。

同时,理学家还指出汉学家不顾民生,只知访碑评帖、搜罗琐屑的证据,甚至考证于不必考之地;虽然他们能观察入微,甚至到了如拇指之细之境地,但

是缺少对全局的把握,因此其盛世则势利相倾,生心害政,所以汉学才会导致社会动乱。正是“其徒事训诂词章者,日钻月研,咬文嚼字,不复知身心为读书之本,陋而未用,于检身、齐家、治生、接物之道一切不讲,一旦侥幸入官,则农桑、水利、学校以及事上官、接僚属、御书吏等事,更觉茫然无措,一毫无异于俗吏之为也”^[4]。因而在左宗棠的《吾学录序》中,就有了天下不乱于发贼,而乱于汉学之说;连主张兼融汉宋之学的曾国藩也认为,风靡一时的考据学不以身心切近为务,必为害于世^[1]。更有人将汉学与国家运道的衰落联系起来,“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讪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入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訕宋儒之过?”^[5]

理学家不仅将清朝之衰落归咎于汉学之流弊,并说其追求的“崇正”、“求实”观念是有功于世用的,指出“世运之转移在人才,而人才之奋兴关乎风俗,风俗之盛衰系乎人心,人心之邪正由于学术”^[3],因此“扶礼教于衰,维廉耻于既做者,皆赖读书明道之功,文教昌明,则士气蒸蒸日上,风俗所由纯也”^[3]。这使上层统治者此时倾向于用理学治世,开始重视理学名臣,如咸丰元年时,理学家唐鉴被皇帝召见达15次之多,官居二品;而曾国藩以理学治军,获毅勇侯封号,拜大学士;倭仁则担任同治帝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一职,并授大学士。因而理学逐渐呈现复兴之势,声势逐渐超越汉学,也带来了著名的“同治中兴”。

由上述可知,政治因素在“汉宋之争”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清代早期康熙之所以提倡理学,是因为满族统治者刚获得政权,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纲常名教,他选择了具有治世功能的理学;而后来的雍正、乾隆之所以提倡汉学,则是在统治比较稳定后,为了将汉族的学者囿于琐碎的金石训诂之中,使其无暇于时政,并以这种方式彰显清朝文治之盛,且选择了具有政治守平功能的汉学,所以不同的政治需要使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因而当清前期统治者重视理学时,理学占上风;当清中期统治者需要汉学时,汉学方帜,“家家许郑,人人贾马”,遂现“汉宋之争”;至道咸同时期,时局动荡,对统治者而言,此时理学治世的政治功能明显优越于汉学守平的政治功能,因而人人崇尚理学,批驳汉学,此时的“汉宋之争”就以理学之

复兴为表象了。

二、学术态势

从学术发展上看,汉学与理学同属经学范畴,均以研习经典为学术基础,而“汉宋之争”中所争的内容,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它们在各自的研究方法下所得到的不同研究结果。其中考据学以文字训诂为主,希望通过研究经文本身能对其真实面貌有一个彻底的了解;理学则以阐发义理为主,依据对经文的传注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圣人之道。虽然两者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汉学家与理学家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才是体现圣学之真谛的学术思想,因而一方面恪守自己本学派的学术特色,另一方面揭露对方学术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之缺失,而汉学家与理学家的做法在某些层面上也体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于明末心学的空疏,清初出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潮,学者们希望能够“通经以致用”,而此时以训诂考据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汉学比较能够体现“实”的学术意义,奠定了其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清代考据学,被称为乾嘉汉学,亦被称为清代考证学或朴学,一直以来被视为清代学术的主要代表。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汉学的描述非常详细。他指出,汉学的学术宗旨在于治学首要明确学术之真相,然后再批评是非得失,所以其主要成绩即在于对古代儒学的研究成果,无不旁征博引,以求最终得其真义、本义,以正一贯之认同,并消除千百年来的误解之处,所以其是“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2]。梁启超还总结出其学风之特色与研究方式:一曰注意,二曰虚己,三曰立说,四曰搜证,五曰断案,六曰推论,并指出以此种学风相矜尚的学者自命此学为“朴学”^[2]。由此可见,它的确是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派别,也使经学的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发挥。有学者评价道:“清人与宋儒不同之点,即治经方法之改良是也。宋儒以来,学者之考古研经,每用主观方法,擅自更改古书;更有增字解经,望文生义诸弊。清儒则专用客观方法以正其失,故彼似近代之科学精神。此亦即其优于宋儒之点也。”^[1]由此可见,汉学的兴起确实有其政治因素,但是它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对于中华几千年的文明,通过汉学家的努力,给予了一次较为准确的全面总结,这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所以汉学的学术研究的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汉

学家对一切与之不同的学术派别皆以压轧之势,对程朱理学解经之学术方法大加批判,尤其是当其他学者对其指责亦有不少切中其弊之处时,他们概不接受的态度,逐步使自己的学术发展进入孤立之境。

至清代道咸同时期,汉学这种“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罗列事物之同类做比较的研究”以及“为窄而深的研究”^[2]的方式,使其逐步由“实”入“虚”,以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便很难再得到以往的成就了。而导致考据学衰落的主要原因,梁启超认为,既由于本学派之自身,也由于环境之变化所促成。尤其从学派自身来看,其“研究方法虽甚精美,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2]。梁启超举例说:“其训诂一科,经由大师之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时糟粕而已;而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等等,但是原物现今既已不存,聚讼也终未由决;而其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袷,言封建,言井田,只是直言古代,而于本世有损益变迁者,则群书亦未由折衷通会”^[2]。最重要的是考证学兴起之初,以其“实”而著称,至今却纷纭于不可究诂之名物制度,已成空言,自然不足以服人了。

对此,晚清理学家夏炯在《乾隆诸君学术论》中有较为具体的刻画:“乾隆以后近百余年来讲学之士,专为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盈千累百,刺刺不休,不特丝毫不适于用,且破坏碎裂,转为贼经。今就其稍著者论之:穿凿性理,故为艰深,勾股割圜,改宣城之面目;六书音韵,窃江氏之绪余,是休宁戴氏之学也。据此校彼,改异为同,明知无用之辨,好为小慧之行,是抱经庐氏之学也。生今反古,以篆代真,说尧典不让三万言之繁,诂禹贡独一二端之得,是民庭江氏之学也。炫博矜奇,以多为富,读史不镜得失,仅详某本或作某,《养新》萃为一录,令人味之无可味,是嘉定钱氏之学也。妄诞已邀宽典,著述仍窃虚名,汉魏之音,掇拾前人所唾弃,传志诸作,不明体要而立言,是稚存洪氏之学也。考工何补匠氏?辨谷正算老农。稟资既愚,不能贯通经注;傅会不合,因而转驳郑君,是新安程氏之学也。割裂本经之句读,变易传注之原解,《广雅》一字,疏至千言;语助之词,汇成巨帙,是高邮王氏之学也。自知浅陋,依傍他人,著书亦觉其多多,鸣虫终诮其唧唧,是金坛段氏之学也;此数人者,皆近百年来稍显著之人,试取其书,平心而察之,徒觉其芜鄙琐碎,坐井观天而已。”^[3]

夏炯指出,乾嘉之学对一文、一字、一句的专注,

破坏了经籍的完整性。而考据学的各个学派却任意穿凿性理,改异为同,做的均是无用之辨,如他们研究文字时贪多求罕,只为罗列资料,不论得失,成果为无味之作;而且他们只顾学者之虚名,根本不注重本体之研究,更无法贯通经注,更甚者不惜割裂本经,变易传注,所以一字一词而至千言之疏解,只是琐碎,只是无用。如此之学,何以养成人才?正是“通经博古之士,……虽其考证象数训诂音韵之间,亦多有补前贤所未逮者,而逐末忘本,搜寻微文碎义,而昧于道德性命之大原,略于经纶匡济之实用,号为经学,而于圣人作经明道立教之旨反晦焉。细之搜而遗其巨,花之摘而弃之实。岂非弊与?”^[6]因此,自乾隆中叶后学术人才之衰、学术之衰,应归咎于考据学之兴。

虽然理学家对考据学之评判有失公允,但是他们提醒我们应再一次审视考据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可以说,清代考据学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度挖掘,不仅使众人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广博,更使学者有感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深邃。而汉学家的努力工作,一方面,使学者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较为确切的面貌,也尽他们所能地弥补了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遗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另一方面,考据学单纯的治学方法,尤其是过于注重一字、一句的训诂,呈现学术琐碎之感,使其难以形成对经籍整体性的概括,更不能使汉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哲学思想加以指导,因而在义理的阐发上显得较为薄弱,以致于在其后期的发展中,它所标榜的“朴实”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空洞。正所谓“考证之学,至惠戴已臻全盛,而弊亦不胜焉。……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生雾霭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7]

由上述可知,汉学的弊端已较难实现新时期的学术发展要求,于是此时的“汉宋之争”在理学家的声讨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从而引起对“汉学”与“理学”关系的再思考。“训诂、义理二者不可偏废。何有汉宋之分哉?今之讲汉学者目宋学为空疏,讲宋学者诟汉学为穿凿,于是有专宗汉学者,有专宗宋学者,判然两途,几几乎不可复合。……累牍连篇,互相攻击,歧汉宋而二之。一若言训诂,则义理可勿谈;言义理,则训诂可勿论也。呜呼!是直学中之蠹矣。”^[8]此语指出,汉学与宋学是不可分的,

也不能分的,而且任何伤害彼此的做法都会对经学的研习有损害,因为“学,一而已,不穷经不可以为学,不讲道不可以为学。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于穿凿。二者相需为用,而弗容以偏胜也。”^[8]也就是说,在研求圣人之道时,既要穷经,又要讲道,缺一不可,失去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后之学者当两宗之,而取其醇,舍其疵,树其闲,决其障。晓然于训诂之非义理弗明,义理之非训诂弗著。合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无穿凿之害,无空虚之病。斯处则可以为师儒,出则可以为卿相。”^[9]由此可见,合汉宋于一体,学者不仅可以为巨儒,贯通经书,更可以作卿相,治国兴邦,两者均属为学之要。

因此,清代道咸同时期主张兼容、综合汉宋之学的人越来越多,如曾国藩、方宗诚、夏炘等理学家及汉学家刘传莹、邵懿辰等。他们以追求儒学的真谛为己任,因而愿意抛弃儒学内部的恩怨与纷争,主动地扬长避短、不争门户,主张汉宋互相融合、会通,以吸收两者学术优势以互补,从而出现“汉宋合流”之势。而这股潮流也使复兴的理学具有了更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从而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结 语

总之,清代统治者因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对汉学与宋学或扬或抑,使两者呈现了“汉宋之争”的局面;而从学术上看,汉学与理学同属经学范畴,所以“汉宋之争”所争的内容,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及其各自所侧重的研究结果。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在研经过程中使学者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较为确切面貌的结果,但其过于注重一字、一句的训诂,忽略了对义理的阐发,因而使其所标榜的“朴实”逐渐转为“虚无”,因此“汉宋之争”最终以晚清理学的复兴而告罄,该学术态势不正是印证了中华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状态吗?

参考文献:

- [1] 萧一山. 清代通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 车冬梅. 晚清理学学术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05.
- [4] 夏 炯. 学术有用无用辨[O]. 民国十四年刻本.

- [5] 张昭军.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6] 方宗诚.柏堂集后编[O].光绪七年刻本.
- [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8] 方浚颐.梦园丛说[O].同治十三年扬州刻本.
- [9] 方浚颐.二知轩文存[O].光绪四年刻本.

Political factors and academic trend in “Contention between Han and Song” in Qing Dynasty

CHE Dong-me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Xi'an 710054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 “Contention between Han and Song” was a specific topic in science development in Qing Dynasty. Through analysis of political factors and academic trend , the developments of Han and Song learning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fates; Han peak in the academic , then from the Han to Song” , again to Han and Song confluence , this academic trend reflects the state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Contention between Han and Song”; political factor; academic trend

(上接第 102 页)

**Between theoretical cre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New Republic” in *Law* of Polatu**

LIU Ming-y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y analysing *Law* of Polatu, the author holds that Polatu had already casted away illus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ay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oom which the objective reality should be given, though he stuck to theoretical creation. So he tried to find out other middle roads through which the noble, the genius, and the mass could articulate with the virtue and the wealth aided by some kind of democratic procedure. The positive factor of the new system is just the law not the genius. Actually, this is another Republic showing great concern over human-beingself.

Key words: virtue; middle of the road; trangible practice; sketching beauty